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丛书

人类学与非洲

Anthropology and Africa

马燕坤 著



非
外
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丛书

人类学与非洲

Anthropology and Africa

马燕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与非洲 / 马燕坤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8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4632 - 0

I. ①人… II. ①马… III. ①人类学—研究—非洲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443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明
责任校对 王福仓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06 千字
定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导 论 | (1) |
|-----------|-----|

第一篇 临摹非洲

| | |
|---------------|------|
| 第一章 阶段 | (31) |
| 第一节 拼图 | (31) |
| 第二节 学科 | (36) |
| 第三节 反思 | (43) |
| 第二章 定位 | (47) |
| 第一节 自述 | (48) |
| 第二节 他述 | (52) |
| 第三节 出路 | (55) |
| 第三章 发现 | (60) |
| 第一节 知识 | (60) |
| 第二节 殖民 | (62) |
| 第三节 后殖民 | (69) |
| 第四章 加工 | (77) |
| 第一节 碎片 | (78) |
| 第二节 事实 | (80) |

2 / 目 录

| | |
|--------------|-------|
| 第三节 情境 | (84) |
| 第五章 抒写 | (93) |
| 第一节 记忆 | (93) |
| 第二节 想象 | (99) |
| 第三节 重构 | (105) |
| 第六章 附会 | (109) |
| 第一节 前奏 | (110) |
| 第二节 文明 | (112) |
| 第三节 发展 | (114) |
| 第七章 挖掘 | (124) |
| 第一节 流变 | (125) |
| 第二节 部落 | (128) |
| 第三节 剧场 | (135) |

第二篇 助力非洲

| | |
|-----------------|-------|
| 第八章 去政治化 | (145) |
| 第一节 政治语境 | (146) |
| 第二节 政治化 | (148) |
| 第三节 去政治化 | (154) |
| 第九章 回归角色 | (160) |
| 第一节 再造传统 | (160) |
| 第二节 重塑主体 | (175) |
| 第十章 文化拯救 | (189) |
| 第一节 非洲的文化 | (190) |

| | | |
|------|-------------|-------|
| 第二节 | 非洲人类学 | (195) |
| 第三节 | 中国人类学 | (198) |
| 第十一章 | 主体互构 | (208) |
| 第一节 | 视角流变 | (208) |
| 第二节 | 认知拓展 | (215) |
| 第十二章 | 中非关系 | (222) |
| 第一节 | 共生战略 | (222) |
| 第二节 | 推己及人 | (238) |
| 第三节 | 互构认同 | (257) |
| 第四节 | 发展阵痛 | (272) |
| 参考文献 | | (287) |

导 论

一 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维度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探讨人及其文化为重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其形成背景与演进轨迹，爆发出一定的戏剧性色彩。

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一门具有一定边界的学科，人类学是在近代才出现的。而以人类学的手法来观察、记载或描述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现象却早于近代。作为现代学术语境下所谓的系统化、专业化、理论化的“人类学”学科，一般还是被认为起源于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及“新航路开辟”之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机的面世，“使得西方人有了获得文化资源的机会，而这些资源正是人类学学科的基础”^①。

自此之后，西方便以自身的理念、文化和知识为准则，凭其价值观及价值标准来认识、定位或区别其他人群，并以“实证主义”方法论建构起关于这些人群的知识谱系。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不断进入并加深着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的控制及奴役，这一情势随即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在此过程中，一种源自于人类学手法、被称之为“民族志”或“人种志”的知识谱系应运而生。

鉴于此，可以认为，产生于西方并在非西方社会得到发扬光大的“人类学”学科，其实是由这样一群研究非西方社会的西方人通过对非

^① [英] 凯蒂·加德纳、[英] 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西方世界的定位（比如，对原住民的定位就较为典型^①）、审视、判断而确立起来的关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谱系。其间，西方理念与非西方理念不可避免地相遇，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难以回避地产生交锋。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一度以研究主体（研究者）是西方人、研究客体（研究对象）是非西方人的事实呈现出来。而此种事实却俨然表明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性。尽管人类学在之后力求尽可能地以当事人的身份去思考和考察研究对象，但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开始就产生的难以弥合的罅隙，最终不得不使得人类学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历了独特的学科命运。

除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分离性，知识与政治之间的交融性，同样是人类学难以回避的命题（其实，借助研究主体是西方人、研究客体是非西方人的事实，就能够一定程度地表明不同的身份属性中包含着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而在不同的社会属性中却体现着一定的国民背景或政治意图）。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使人类学从一开始就穿梭于作为科学性的学科与作为利益工具的政治之间。即便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瓦解后，在非洲对主体性的追求及对本土知识的重构过程中，仍然穿插着学科与政治互动的逻辑。一直以来，人类学在努力追求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时候，它在非洲大陆依然被当作人们制定公共政策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被当作是实施公共决策及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探索研究过程中，作为学科的人类学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因为人类学家的选择和期待受制于他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甚至他的国民背景、族群身份或社会地位等。尽管也有人类学家部分地做到了对上述范畴的超越，但是，人类学浓厚的西方渊源性、研究对象的“他者”性，以及聚集主流观念的社会性，却难以抹去其至少在历史上就是政治妥协、政策协商，以及学科

^① “与人们通常以为的不同，‘原住民’并非指称一种原初和真实的存在状态。相反，正如我们在梅因那里看到的，‘原住民’是殖民国家创造出来的：在被殖民状态下，原住民被定位，被地方化，被文明遗弃和成为被遗弃者，被限制在习俗之内，然后又被界定为这种习俗的产物。”参见 [乌干达]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界而治之》，田立年译，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英文版前言第 8 页。

创建者们小心维护的边界色彩。

长期以来，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始终处在影响人们认识的交叉口上。这既牵涉到学科与政治独立性的问题，也牵涉到学科与政治交融性的问题；既牵涉到知识创造的问题，也牵涉到科学技术怂恿的问题。

随着时空的不断推进，对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从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化的切入点来探索，已是认识和理解非洲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研究已愈来愈是非洲走向国际化，以及国际社会与非洲交往过程中提升人们价值与素养的一门重要学问（对于那些与非洲有着交往的国家、民族、地区或个人来说，具备人类学视野下非洲及其社会文化的相关知识，无疑能一定程度地减轻其在与非洲国家或社会各主体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阻力及障碍）。

这样，人类学就像是一副透镜。借助这副透镜，能够发现西方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技术民主及理性政治在深入非洲时所造成的偏执、狭隘，是如何使得非洲“道法自然”的社会格局遭到异化的。并且，借助这副透镜，还“能够让人懂得，在民族志描写所特有的细节关注”，以及“要求根据这种描写构建起来的模型所具备的效力和普适性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有直接的关联”^①。人类学与非洲之间必然演绎出一段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进程。

关于人类学与非洲的关系探索，鉴于既定的历史渊源性及特定的社会轨迹性，对于一项基础性研究而言，一定意义地需要将科学研究当作政治主题来加以探索，以达到理解非洲社会历史进程而非因果解释非洲社会历史事实之目的。

在本书中，将人类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置于非洲大陆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下来进行梳理和考察，旨在探索人类学是如何以非洲大陆为基础而锻造出一定的知识谱系以及人类学与非洲大陆的内在关联性是如何影响人类学本身的发展进程的，同时鉴于人类学知识的广泛传播，洞察其又是如何影响世界对非洲的认知的。

^①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一）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及演化

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文化一直相随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生计以及行为实践过程之中而不断延续和拓展着，并呈现出自然化、生活化及朴素性、习性性、有机性的特点。人类古老的传统因之得以传承和推进，人们之间的行为关系亦形成一定的模式，社会形态随即呈现出相应的禀赋性特质集合的征候。这一切无不是知识、文化发挥黄金本位作用的核心体现。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持续推进，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推动人类迈向更深邃未知领域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瓦解自我世界的步伐。自然科学的发展逻辑及研究机制，影响了人们探寻生活世界的人文方法论（比如，自然科学领域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出现，不仅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还使得人们身边所发生的事项变得具有可量化性）。以至于原先属于人类自醒自觉的知识结构、文化模式，衍生出了超有机体的意义谱系，变成了能够被量化、符合某种规范、遵循某种准则的机械性产物。知识、文化一改原初的本真态，沦为与人为定制逻辑、实证主义机制相适应的“存在”，丧失了应然的生长机制。

历史上，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所取得的实证主义成就，确实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从中获得新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见解，以及最终促成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从事相关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崛起，很明显就是社会科学汲取自然科学养料并获得突破性创造的有力见证（比如，“结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兴起是现代数学的某些发展的间接产物；这些发展赋予质的观点以愈来愈大的重要性，同时避开了传统数学的量的角度”^①）。

一时间，因自然科学诱发而滋生的实证主义像发酵的面粉一样再也无法抑制高温之中的膨胀，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传统的知识和文化，在此番时新且“理性”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诱导下，在些许保留或完全超离本真态的境况下获得貌似生机勃勃

^① [法]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勃的发展景象。人类社会由此变得既能够体现客观存在，也能够创造客观存在；既能够体现自身与他者的差异，也能够创造自身与他者的差异。

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多种具有根本性效力的作用力。其中，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就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使得人们的知识视野从关注远离身体的神秘自然界被拉回到对生活世界的重视上来。这一变动的结果，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主体性：自我并非是抽象的，也并非是非定型不变的，而是能够表述内在、具备自主之韵、拥有内生动力及秉持固有轨迹的客观存在。

为追逐自主性及主体性，人类随之发起了漫长而艰巨的拉锯战。

对于此，社会科学并未置之度外，而是毫无保留地卷入到这种具有政治性、身份性或地位性诉求的主体性及自主性的探索进程中来。社会科学研究承认人的主体性诉求既是人本身内在的、固有的诉求，也是外界社会给予的身份及角色认定。由于所牵涉到的是外界给予的身份及角色认定，那么，关于主体性的获得就难免不是外力作用下的结果。

在实际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在承认知识来源于生产劳动、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同时，并没有否认知识高于人类（能够指导实践，具有实践指导性）、能够被书写或被缔造的客观事实。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社会科学在对人类主体性诉求展开探索的背后却制造出人类整体分化的现实。毕竟，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主体构成的，而不同的主体又具有不同的主体性诉求。分化，显然可见一斑。

假若社会科学确实缔造出了人类整体分化的现实，那么，这一情形似乎将会随着时代的持续推进以及理性因素与非理性的较量而不断得以强化。毕竟，从理论层面上看，“理性因素”要求“科学”“实证主义”与之匹配，而“非理性因素”呼吁“非科学”“诗性”与之联袂。这样下去，人类整体至少在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撕裂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着分化的风险。

这一情形再往后延伸，甚至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结果便是，社会科学研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构思精巧的写作“诗学”，而较少具有研究对象作为主位的自述之韵。想象、文饰、美感、会意等系列具有话语力量的主词，在经过媒介加工之后便理所当然地登上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雅

之堂，最终演化成惯性的认识逻辑和推理模式。再后来，尽管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某种意义上练就了一身深厚的科学涵养，但是，剔除这一现象后，仍能发掘其在发展进程中的知识依附性及政治寄生性，而很少能够在实际研究中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

社会科学的这一研究状况，可追溯到人类发展史从神学到世界主义的戏剧性变更的进程中来。这一变更，由此不仅增补了生机而多舛、繁荣且危机重重的国际政治内容，而且还使得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出现地方习俗与普遍文明、地方性与世界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等维度对立统一的矛盾性特质。据此，可导出此番认识：社会科学可能是与研究对象相贴切的，也可能是与特定环境相匹配的，还可能是应合时代趋势和社会推理的产物，甚至可能是出于某种主观臆断而想象性编排的结果。

若再将研究视野向前推移，仍能洞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较早地为知识、文化发展预设了前行轨迹。溯源国家之起源，能够发现国家机器的建立使国家之间分享了普遍化身份——都同样具有主权独立性。但是，国家之间也因为边界/疆界的确立，而体现出与他国之区别或不同。通过边界/疆界，国家确立了地理意义上的领土范围，政治意义上的主权归属，以及文化认同上的角色身份。国际政治/国家间关系，也由此便是这些既类同又区别的国家之间所向披靡构成要素辐射的结果。这些构成要素包括国家的认识、认同、理念、价值观、知识谱系、意识形态，等等。而当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带着这些与母国息息相关的情愫进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时，所缔造出的研究结论也分明会大相径庭。也就是说，某种可称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本位主义的内容，会不设防地作用于研究者的研究过程和结果之中。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映射出由某种权力因素主导或支配的深意。就此而言，科学与政治确实交融共生、难分彼此。

现实发展则充分表明，国家能够以操纵一切的行为体角色，在国家权力与知识、文化之间画上联系的同时，也能够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或本位主义而切断国家之间在更多方面可能或必然发生的联通机制。总体上，在国际化进程中，国家始终扮演着决断一切动机和行动的主要行为体角色。（设若没有国家这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政治便是缺乏内容的空洞存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会因为权力博弈的缺乏而略显平实。）

随着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日益成为普遍事实后，昭示着特定的国际交往的出现。如何与其他国家顺利（进攻型或防御型）交往，其身份是作为个体代表单个国家或国家自身，还是作为集体代表所有国家或国家共同体而概念化及实践化，始终是国家不得不在国际化与自主性之间面对的重大议题。尽管此种情形并不能完全较好地体现国家固有的诉求和内在价值，但是，却产生了国家间关系跨越个体的、单数的形式而朝着超国际性的、共同体的方向迈进的事实。总体上，随着时代的推进，由一个国家来决定国际走向及前景的情况，已越来越不具有现实必然性。不同国家的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亦越来越不再是随心所欲人群之间的自由流动往来，而是在国家主体统领下行为意义的整合及社会结构的组合。可以说，国家作为重要的行为体，始终在决断及影响一些事件上发挥着重大的支撑性作用。

在此情形下，各国家、各民族对本国及本民族知识、文化的认同度或自信心不可避免地会被强化。这显然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本位主义作用期间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也因此而暴露出较为尴尬的一面：处于强权地位的一方国家或民族势必会对权力地位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国家或民族形成强制或胁迫态势。历史上，部分国家，特别是那些试图以其他国家之物力、人力，而提升自身财力（生产力）并寄希望于创造发展奇迹的资本主义国家，毫不掩饰其动机和欲望，摒弃了国家间最初以“盟誓”订立下的契约，而动用了军事力量和政治暴力，采取僭越他国主权的侵略行动，在使自身获得满足感（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同时，却将像自身一样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的主体性剥夺了，最终致使受奴役的国家在丧失自我的同时，失去一切，包括失去对本国及本民族知识、文化学习、传播、继承或控制等方面的能力。20世纪中下叶，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一再纠正着国家发展史上的这一偏差。被殖民的国家的反抗，以及独立主权的最终获得，就是能够较好地纠正这一偏差的具体行动。以至于被殖民国家的知识、文化，曾经由某一强权势力主宰的局面遭到有史以来最为罕见而深度的叩击。被殖民的国家独立主权的最终获得，迎来了该国民族文化知识或本国文化知识自觉及自信发展的曙光。

客观地看，西方作为基督教文明的渊源之地，一直以来并未因为

其拥有一套神学上的道德规范、严厉教规及普遍公约的严格限制，而使其以炮剑侵占别国的动机有所缓和或休止。相反，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西方通过战争及武器向非西方宣泄充沛精力（标榜其价值观、文明观、物质观及利益观等的优越性）以期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动，却由此而被推到人类历史的巅峰。即便西方始终大放厥词打着拯救非西方的旗号，并随时捉襟见肘地试图为其武力扩张寻找道德上的庇护，但是，西方庞大的国家机器升华有产阶级好战天性的嗜好，却没有得到任何收敛。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在将其价值观推向非西方时，也使凶残野蛮的强制手段和侵略行为与民主、正义、理性、科学搅和在一起，最终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人类文明进程本身固有的内涵和精髓。

随着 20 世纪独立主权成为普遍事实后，西方国家的权力性质似乎发生了一定意义的转变：强制性被蕴藏起来，鸣锣开道的却是其以新的姿态来标榜的理性、民主、科学之旗号。尽管非西方已获得独立自主权，但是，无论其求变的心愿如何强烈、行动何等坚定，却并未能因此而根本地改变国际权力（其实是由西方国家权力主导的国际主流趋势）发展的惯性，以及国际权力所保持的令人惊奇的连续性：殖民主义统治体系崩溃后，国际权力依然与这些手握军事力量、执掌经济优势和享有声望美誉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随着国家军事力量、经济优势和声望美誉的增进而不断强化着。而西方国家就是这一重要的主角。西方国家始终以其习惯性的强制方式塑造着国际性的普遍权威；西方国家的权力话语被一再置于普遍的国际公共权威之上，成为能够满足西方自身欲望的颇具煽动力的工具。国际政治由此演化成为似乎就是更具有实力、更富有权力的国家（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势的国家）一意孤行的战略展演，而并非是满足感各异、内在诉求不同、价值取向迥然的国家之愿望与行动结合的整合性体现。

加之，由于理性主义横行的幌子，西方对人类公共权威的暴力垄断，比通常认为的那样更加执拗、复杂而难以计算。在西方主导世界趋势的过程中，西方的物质利益和精神气质杂糅在一起进攻，造成对非西方钳形夹击的包围之势，明显地塑造出西方想象中的规范意义上的“他者”，并使“他者”丧失本应具有的制度性结构及有机性生长模式。

西方理性主义的本质由此变得耐人寻味。由此延伸出的结局便是非西方受制于西方，变成西方的注脚。在具体方式上，非西方却通过“效忠”“服从”维持着与西方的关系秩序，在等级和差别明显存在的客观情况下维系着“和平”。面对非西方的“失语”，西方便以千禧年般的欣喜认为已推动了政治现代化及理性民主的发展，实现了对普遍价值及一致认同的推广，革除了阻碍人类发展进步的顽疾及障碍（西方所达到或破除的这些内容，在西方看来，恰恰就是非西方难以胜任、比拟的那类东西）。然而，在实际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制造出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反讽韵味十足的距离，结果激起非西方不再被动接受西方系统再分配“公共物品”的意识及实践。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发起、扩大以及最终取得的胜利，由此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然的态势。

由于长期以来西方以凌驾之势控制着非西方（这种控制最为突出的是表现在主权及政权的控制上），以至于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变相地成为与西方政治行动相适应的存在。随着此番凌驾性态势逐渐被打破（此番逐渐被打破，既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贡献，也有近现代以来第三世界不断发展壮大的贡献，尤其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政治经济发展成就的积极作为。这一系列条件，无疑对西方国家一直秉持的凌驾性态势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科学不得不开始对追求幻灭后的自身社会展开重新审视。

在经过一系列自我反思性探索之后，西方发现自身政治动机及秩序生产方式背后隐藏着的非理性（西方认识到自身拥有的并非就是理性，非理性并非也只属于非西方，西方同样具有非理性的意识及行为），以及所追逐的类似蚂蚁型经验主义的数据搜集与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理论的知识逻辑亦存在着极度的牵强性。进入新的历史时空，随着非西方的日益崛起，西方社会科学逐渐警觉到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唯现代主义信仰试图深入非西方机制的努力，只会削弱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结构，诋毁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价值，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科学作为科学学问的工作准则。为此，至少可以重整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就能些许地遏制这一发展颓势。

（二）西方社会科学经历的转变

西方社会科学，是一种与西方的价值体系、发展机制及社会结构等

一脉相承的知识谱系。这一知识谱系的编织，历经了几个重要的发展环节：神本性向人本性的转变；由知识建构论向实在论的转变；从思考西方人自己转移到对域外非西方社会的关注；由自我价值追求到自我价值外推；等等。经由这一系列转变，西方人及西方社会观瞻世界的视野开阔了，研究内容丰富了，社会科学内涵提升了，学科价值目标亦日渐清晰了。

1. 由神本性向人本性的转变

西方社会科学经历过一个宗教与科学较量的发展过程。在启蒙运动以前，宗教一直支配着社会运转。一切思辨和探索基本围绕宗教活动展开。宗教成为牵引人们认知、行为及实践的价值准则。由于宗教处于支配性地位，因而，即便存在超越神学的研究（其实这样的研究即便可能，也难登“大雅之堂”），在根本上也不过是服务于宗教之需而存在的内容。这一时期是宗教驱逐人性的“黑暗时期”。人性或以人为本的行为实践遭到最为彻底的叩击。

而在这之后，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成为捅破这一黑暗牢笼的重要尝试。本质地，启蒙运动使得社会的价值观、价值理念及标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们试图逃脱宗教信条的束缚，打破宗教奴役的枷锁，重新发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内涵及价值意义所在。各种作为威胁宗教神圣性的世俗力量的纷纷崛起，使得宗教的传统价值观及价值理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顺应实证主义潮流而展开的社会科学研究，捍卫了进化论思潮，驳斥了宗教神学所宣扬的以神为本的逻辑思路。“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开始对传统思维、认识、理念及行为等做出极力叩击。社会科学则以关注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轨迹为重，同时，其所倡议并重视的人本性探索得到了应时性的凸显。社会科学借此力图通过各种视角“论证人脱离动物界进入‘人界’、并最终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①，以期从中发现人并不是上帝的创造，能够主宰人类的也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身。加之，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通过实验不断取得一系列的成果，更加剧了人们对宗教言说及其动员机制产生质疑，更促动了人们树立起对人本身的自信心及信任感。总之，由神本性向人本性转变，不仅加速了人自身

^①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及其社会的解放，而且还促使西方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上走向发展和取得突破。

2. 由知识建构论向实在论的转变

西方社会科学诞生于西方特殊的历史背景及语境之下，以至于其一开始就不可避免的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轴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扩张，在促使西方将非西方沦为原材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及被奴役对象的同时，也使得非西方成为屈尊于西方知识及文化背景的异化角色。基于此，西方亦因此而些许地解决了殖民主义统治过程中的治理难题。在具体环节上，殖民主义统治者亟须对研究对象做出考察、探究和“关怀”，以期服务于殖民统治之需。随着殖民主义统治者对非西方世界侵略的不断加深，这种需求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亦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于是，西方视野下的非西方社会从而成为一种西方意志支配下的产物，成为一种根据西方价值标准推演出的应景性结果。这一切能够充分表明的是：非西方不过是西方建构的产物；本应以客观性存在的非西方，在其形象或身份特质等方面不过是沾满了西方主观臆断的色彩。

一直以来，尽管在西方看来结论上是“确凿”的事实（比如，非西方是西方的前现代），但却不能由此真正体现出西方自然科学成就战胜神本性的历史价值与真正意义；尽管社会科学所建构的研究对象业已被某种程度地认可或接受，但却很难说明其就是客观事实的真切体现，更难说明其就不是单纯知识、外来文化附会的结果。

随着殖民主义统治体系的崩溃与非西方的崛起，人们开始对社会科学建构的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及其民主进步的断言产生怀疑：难道社会科学的技术或方法论总能提升人类的价值？总能确保人们的利益？鉴于此，从客观实在论的角度重新发现曾被当作研究对象之本来面目，已是社会历史在经历震荡之后的必然诉求；从客观实在论的角度对“他者”展开重新考察和探索，已是避免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科学研究曾力主的可靠性标准造成不良影响再次爆发的必然选择。这种由建构论向实在论的方法论转变，不仅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型，而且还使得研究对象能够被“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从而一定程度地拉回一切曾远离于人本身的过往历史。